

川大史学·专门史卷(三)

川大史学

专门史(三)

卷

(民族史)

石硕 主编
徐君 副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川大史學·專門史叢刊三



中國史 (三)



《民國史》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专门史(三)
(民族史)

川大史学

石 硕 主编 徐 君 副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庄 剑 徐 君(特邀)
责任校对:吴雨时 吉正芬(特邀) 童婵婵(特邀)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大史学·专门史卷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8
ISBN 7-5614-3495-2

I. 川... II. 四...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0071 号

书名 川大史学·专门史卷(三)——民族史

主 编	石 硕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180.25
字 数	423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 ~ 1 300 册
定 价	450.00 元(全七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冉光荣	石 硕	孙锦泉	刘复生
任新建	何一民	何 平	罗志田	陈廷湘
杨天宏	徐亮工	郭 齐	彭裕商	舒大刚
蔡崇榜	霍 巍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 长：王挺之

副组长：孙锦泉、舒大刚（常务）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应平	孙锦泉	李德英	陈廷湘
杨秀春	徐开来	舒大刚	鲍成志	霍 巍

秘 书：辛 旭

序

历史学是四川大学的优势学科，也是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在 1902 年开设的四川高等学堂中，即要求学生入校先学习包括外国历史在内的公共科。1910 年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中，史学与经学、词章并列，1918 年改名为历史科。1924 年国立成都大学正式组建了史学系，是川大历史上最早设立的 10 个系之一。

百余年来，张森楷、何鲁之、刘揆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激、丁山、陈衡哲、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吴天墀、胡鉴民、任乃强、杨人楩、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闻宥、常乃德、钱穆、缪钺、蒙思明、萧公权、卢剑波、谭英华、萧一山、吴廷璆、杨东莼、周传儒、柳诒徵、韩儒林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先后在此设帐授学，为川大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术繁荣的基础是不同学术风格的交流融会。回顾川大的史学发展史，至少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的学术流派。首先是近代“蜀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史之学”的传统。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先后在川大史学系任教的近代蜀学传人包括张森楷、叶秉诚、祝同曾、蒙文通等，在史学系之外则有龚道耕、刘咸炘、庞石帚等。在治学取向上，他们多重视古经、正史等基本典籍的训练，崇尚博通的治学取向，留意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与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重视新材料扩充、重视问题意识等取向不

无距离。不过，这些学人也多少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具体情形又随个人和时代不同）。

其次是一批基本为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所包纳而又与主流有所疏离的学人，包括何鲁之、刘棨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澂等。他们或是留学生（多为留法者），或在国内受到较为完整的史学训练（多出自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在文化观念上，他们不赞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主流派新史学不无批评，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而思想资源则更多地来自西学。他们之中不少人热衷于引介欧、美史学新理论，如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史学观念上，他们强调过去与现在并非渺不相涉，不主张将历史事实做孤立考察，而更注重其连贯性；同时，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对“问题”的解决，而尤其体现为对现实的启示意义。用何鲁之的话说，就是侧重“史学智识”，而非“历史整理”。

上述两批学者在文化态度、史学意义的认知上都颇有同调之处，与其时在国内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史学有着较大差异。他们的学术取向对后者不无纠偏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川大史学的影响力。

自 30 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抗战以后，一批主流派新史家进入川大，对史学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川大史学灌注了新的活力，也推动了川大史学地位的迅速提升。

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是这一学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徐中舒的一手培养下，古文字学和先秦史在川大生根结果，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地位。在考古学方面，田野调查与发掘之风兴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汉骥的提议和领导下，川大史学系

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四川文物调查、三星堆、汶川石棺墓和前蜀王建墓的发掘等多项工作。

在注重实地调查风气的影响下，一批新的学术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也日益受到重视。30年代末，冯汉骥两次前往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40年代初，胡鉴民对羌族、苗族等民族进行了调查。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川大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了《康藏研究月刊》，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极大声誉。

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40年代初，川大史地系表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形殊异，各校各具特色，如地方及专题研究，皆当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置其最适宜之选修课（如川大因特殊环境与需要，即设有‘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学程，定为三、四年级选科），庶能发展特长，有益实用。”随着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学者先后加入到巴蜀史的研究中，这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地方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的关注并形成川大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早在1927年，徐中舒就将传统学人视为一脉承继的殷、周相代看作两个不同民族的斗争。同年，蒙文通也发表了其成名作《古史甄微》，提出了有名的上古民族“三系说”。任乃强转入民族学，也是由地理起步。1941年，史学系正式改名史地系。虽然1947年史、地系分家，但对时、空加以综合研究的学术取向则一直延续至今。

就学术建制而言，今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学科。华大学者在中国边疆研究、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有独到之长，学术风格更近于主流派新史家。

华大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机构建设和“集众研究”，其中，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大学博物馆等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另外，跨学科研究、注重边缘和底层文化均是其特色之一。

华大历史学科早期的领导者主要是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等外国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开始取代了他们的地位。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由李安宅负实际责任，研究所成员有郑象铎、任乃强、于式玉等。由于成绩突出，仅仅成立一两年的时间，研究所就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1943年年鉴》。1941年，博物馆馆长一职由郑德坤接任。他与林名均、梁钊韬、苏立文、宋蜀青、宋蜀华等学者一道，继续推进博物馆建设，组织考古发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巴蜀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拉开序幕。华大历史学科全部并入川大，奠定了此后五十多年直到今天川大史学的基本格局。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学术前辈的引导下，川大史学研究形成了既注重新材料的搜集运用和实地调研，又注重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注重专业化的“问题意识”，又注重“通识”眼光的学术特色。

20世纪5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古文字学、地方史、考古学、民族史、西南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等传统优势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度成为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1981年颁布的首批博士点中，川大历史系就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两个专业入选。与此同时，一批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近现代

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城市史、世界上古中古史、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等也逐渐得到开拓，有的已跃居国内学界之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后被授予“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5年）、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0年）、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2001），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06年是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盛事，总结100多年来的办学与科研成就，推动学术的新发展，在学校的统筹规划下，我们特决定出版一套15卷本的《川大史学》丛书，分为“大师卷”和“专业卷”两个序列。“大师卷”中收录了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李思纯、任乃强六位先生的著作，代表了川大史学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最高成就。应该说，长期在川大历史系工作而成就足以当得上“大师”之名的不止这六位先生，但这次由于时间仓促，不及为他们一一编辑专集，希望以后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专业卷”按照二级（或三级）学科分卷，尽可能地收录在川大工作过的学者的论文。其中既有已经享誉学界的名家，也有“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因此，文章的质量必定各有高下、参差不齐，但对于每一个曾经和正在为川大史学的建设付出热情与心血的学者，能够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应该说也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历史文化学院

2006. 7

前 言

中国民族史，尤其是西南民族史研究，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最具影响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徐中舒先生通过对辽、契丹、女真等的个体研究，以综合探索先秦时期的历史面貌。蒙文通先生对先秦时期纷繁的民族关系作了梳理与揭示，其系列成果不仅学术水准高，且在方法论上产生了突破，为四川大学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0 世纪 30—40 年代是四川大学民族史研究奠基与开拓的重要时期。早在 1922 年，川大就成立了以外籍学者为主体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展开对四川以至西南民族地区的学术研究，创办了民族研究的重要刊物《华西边疆研究月报》（英文）。30—40 年代，出于对边疆危机的深度关切，冯汉骥、张怡荪、闻宥、胡鉴民、任乃强、邓少琴、罗荣宗、李安宅等教师，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投身边疆民族的田野调查，不仅取得了不少新鲜资料，而且撰写了大量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四川大学西南民族研究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41 年，李安宅先生发起成立了以西南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华西边疆研究所，出版《华西边疆研究》杂志（英文）。1947 年夏，任乃强先生发起成立了“康藏研究社”，并出版发行《康藏研究前锋》杂志。1947 年 9 月，川大学生自己也成立了“国立四川大学边疆研究学会”，志在深化学术研究之同时，激发国人对边疆问题关注的热情。一批同学相继投入到西南民族的研究工作中，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并撰写毕业论文。后来，一部分教师如冯汉骥、胡鉴民、谭英华等转移了研究

方向，但他们参与进行的西南民族研究，共同开创了四川大学民族史研究的空前辉煌，功不可没。

至50年代，国家为编写五套民族丛书，组织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调查。四川大学历史系少数师生如蒙默、钱安靖、李必忠、谢忠樑、冉光荣等加入了调研队伍。这次活动甚有助于他们后来研究工作的开展。

80年代开始了专门史研究。冉光荣教授与李绍明、周锡银两位研究员（均为川大毕业生）共同完成了第一部民族专史——《羌族史》；吴天墀先生的名著《西夏史稿》也相继问世；童恩正先生把考古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进行民族史研究。其后一批中青年学者表现了非凡实力，开展了更广泛和深入地研究，成果如石硕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刘复生的《夔国与泸夷》等。

90年代，随着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势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西南民族研究的广度、深度均有显著进展。西藏及其他藏区考古成果，为藏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霍巍的《西藏西部佛教文明》等便是代表。同时，人类学、民族学等新的理论运用，以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交叉，也为西南民族研究带来了一番新的景象。

进入21世纪，随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基地的先后成立，以及其他条件的支持，四川大学民族研究又将跨入下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本文集旨在记录四川大学民族研究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文集只收录了在川大历史系任教的学者成果，兼之篇幅有限，以致不少作者的高水平论著及调查资料不能在本文集中反映出来。但人们将铭记其学术贡献，永崇其研究精神。

冉光荣

2006年7月

目 录

庄跻王滇辨	蒙文通 (1)
德格土司世谱	任乃强 (25)
羌族之信仰与习为	胡鉴民 (56)
夜郎史迹初探	徐中舒 (91)
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	李安宅 (112)
ON THE LANGUAGES OF LI FAN	
..... Wen Yu (闻宥) (157)	
北朝之鲜卑语	缪 钺 (162)
解放前西双版纳的社会结构	赵卫邦 (190)
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	吴天墀 (208)
说“锅庄”	谭英华 (228)
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	蒙 默 (252)
试论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	钱安靖 (287)
春秋时代的戎狄夷蛮	唐嘉弘 (309)
凉山彝族人口问题浅析	程贤敏 (344)
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宋治民 (373)
四川盆地巴文化的探索	林 向 (391)
论正确对待我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关系	胡昭曦 (409)
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	
——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	童恩正 (422)
川滇民族地区的“蕃租”、“汉佃”	冉光荣 (437)

-
- 湘西土家“八蛮”研究 石应平 (458)
- 析“僚人入蜀”的影响 周蜀蓉 (477)
- 一个隐含藏族起源真相的文本
——对藏族始祖传说中“猕猴”与“罗刹女”含义的释读
..... 石 硕 (489)
- 西藏与内地沿海城市化比较研究 李 涛 (511)
- 清代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开发问题研究 杨明洪 (535)
- 近代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 徐 君 (552)
- 论周洪谟对山都掌人的土流分治策 陈 波 (572)

庄蹻王滇辨

蒙文通*

无论是探讨西南民族的古代史，或者是探讨战国时期西南的民族关系，无有不征引“庄蹻王滇”这一传说的。这一传说始见于故事发生后约一百八十年的作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史记》的原文是：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应依《汉书》删蜀字）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颀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

就在这短短百多个字的记叙中，不论是在事件发生的时间上、路线上、地域上和人物上，都有问题。因而这一传说究竟有多大可靠程度、有多少史料价值，是值得考虑的。我愿在这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同志们讨论。

* 蒙文通（1894—1968），自20世纪20年代起，任教于四川大学。

(一)

司马迁的说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班固首先便完全接受这个说法，所著《汉书·西南夷传》便是转抄《史记》，除个别文字差异外，全是照抄。但是，早在东汉末年，荀悦就已提出了不同的说法。我们知道，荀悦《汉纪》是据班固《汉书》删约改编而成，文字虽较简略而史事则全依班固，独所载庄蹻一事则与班氏不同：

初，楚庄王使将军庄蹻，循江略地黔中南以西，蹻至靡漠，地方三百里。其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既克定之，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蹻因其众王靡漠，变服从其俗。秦时尝通五尺之道，于此诸国颇置长吏。（卷十元光五年下）

这一说法之与《史》、《汉》不同，是非常显著的。这一说法虽不见后人引用，不为后世所重视，但这一说法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这时候，滇池、劳深、靡漠等地已被汉王朝统治了三百年，他们的历史情况已更多的为人们所掌握。《论衡·佚文篇》说：“扬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夫以三府掾吏丛积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览其文。子山之传，岂必审是，传闻依为之有状，会三府之士终不能为，子山为之，斯须不难。”可知西南民族的历史问题早已受到当时政府和官吏的注意，已搜集了不少的历史资料（丛积成才）。荀悦可能就是根据这类资料而提出新说的。则司马迁的说法，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发生动摇，已不为史家所信奉了。

紧接着《汉纪》之后，《后汉书·西南夷传》又提出和《史》、《汉》不同的说法，而且和《汉纪》的说法也不相同。我

他们认为范蔚宗也当是别有根据的。他在《西南夷传·夜郎传》中说：

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
檣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檣船牂
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

《后汉书》这一段文字与《汉纪》又不同，改“庄蹻”作“庄豪”，既说“灭夜郎”，又说“因留王滇池”。但在《滇王传》中却又说：“滇王者，庄蹻之后也”。两文似有矛盾。既说“留王滇池”，但把庄豪叙在《夜郎传》中，也觉可怪。范蔚宗以前《续汉书》之类本有多家，未知范氏此文究本之何家。《艺文类聚》卷七一引《华阳国志》全与此文相同，仅“庄豪”作“庄蹻”为异。自然也可以说是范氏是取之常璩之书，惟唐、宋人引《华阳国志》凡六七见，皆无“留王滇池”一语；且范氏此文后有“牂柯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二句，《类聚》所引《华阳国志》文后亦有此二句，今本《华阳国志》此二句原在牂柯郡下，《类聚》引文不应将别处原文移置于庄蹻条下而全同范氏。又凡唐、宋人引《华阳国志》皆无此二句，可知《类聚》所引实当为范书，而传写误为《常志》。类书若此者其例甚多，当非范书本于《华阳国志》。

常道将《华阳国志》是根据《南裔志》等书而作成的，当然也看见《东观汉纪》和司马彪等人的书。常、范两家似有共同的根据，而又各自别有所取的，都和《史记》、《汉纪》等书又不同。《华阳国志·南中志》载：

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牂柯系船。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滇池。蹻，楚庄王苗裔也。以牂柯系船，因名且兰为牂柯国，分侯支党，传数百年。秦并蜀，通